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

党委统战部开展系列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

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重温多党合作历史,弘扬优良传统,党委统战部在我校统战成员中广泛开展“追忆革命前辈足迹,接受红色传统教育;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主题的教育实践系列纪念活动。

举办征文活动

为让我校广大统战成员深入了解“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党委统战部在4月初开展以“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征文回顾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先辈们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团结奋斗的光辉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展示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党合作中创新发展的精神风貌。

组织参观学习

党委统战部紧紧围绕“追忆革命前辈足迹,接受红色传统教育;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政治引领主题,通过参观教育基地等方式,在我校统战成员中广泛开展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教育实践活动。4月20日组织侨联成员参观安吴青年训练班纪念馆和国学大师吴宓先生的陵园;4月27日组织无党派成员参观苏北战役纪念馆和丰图义仓党风廉政教育基地;5月10日组织7个民主党派基层支部成员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5月19日组织各民主党派基层支部主委前往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参观“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图文展”;5月12日我校民革支部组织全体成员参观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实践活动,使大家在重温历史中铭记合作初心,在弘扬传统中深化政治共识。

召开座谈会

5月25日,党委统战部组织召开我校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30余人参加,校党委书记肖道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统战部部长李宝丽主持。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座谈会上畅所欲言,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党合作形成发展的历史,“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贡献、现实意义、承载精神,回顾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光辉历程,畅谈了不忘合作初心、携手前进的工作打算。大家重温历史、深化共识,表达了不忘多党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的决心和信念。

肖道远在讲话中强调,校党委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希望我校广大统战成员继承发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优良传统,牢记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始终保持政治方向不变、优良传统不变,立足本职、做出贡献。他对我校统战成员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加强学习,要以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为契机,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确保多党合作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独特优势,做事有为,把学习活动真正落到实处,切实提高履职参政能力,为学校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三是加强自身建设,切实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以及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切实承担起时代赋予参政党的责任和使命,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多党合作要求。特别是要加强与党委统战部的沟通联系,共同开创学校统战工作新局面。

一系列活动的集中开展,使我校广大统战成员对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活动的重要意义有了深刻的理解,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担当,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解和认同。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为契机,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将铭记合作初心,做好本职工作,提升履职能力,为学校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党委统战部)

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中国政治生活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民主同盟会西北政法大学支部 张师伟)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协商民主具有相当的流行性。虽然不同的学者在什么是协商民主及协商民主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上的看法差异较大,但各种代表性的观点都不否定“协商民主”作为一个概念起源于西方这个现实。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具有悠久的协商民主传统,并从历代政治经验及制度中寻找“协商”的事实,但在结论上却不无偏颇。因为虽然民主不能回避协商,民主如果不协商就简直难以以为继,但绝不能误以为协商就是民主。中国的民主具有鲜明的非竞争性协商特征。如果人们从当代中国民主的非竞争性入手认识中国的民主,或许可以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民主作为现代政治生活法治化安排”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与意义。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孕育并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在人民革命的政治实践中一步步地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起来。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人民民主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并以阶级分析来界定人民,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人民民主的政治实践。在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及实践上都主要是强调工农兵范围内的人民民主,其所理解人民的范围基本等同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所确定的革命的朋友。这个阶段所颁布的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及选举法规等不仅都明定地给出了人民与敌人的界限划分,而且明确了享有政治权利的人民在阶级上的范围就是工农兵。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继续以人民为主体,但在新形势之下,人民的阶级范围较苏维埃时期相对宽一些,而且这个阶段人民在制度形式上实行了“三三制”,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表现出了更多各地抗日革命阶级协商的特点。这个范式的人民民主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继续在解放区实行,并在思想上影响了全国范围内民主政治的模式选择。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在制度上就是要落实为各革命阶级的合作民主,这种民主政治在制度形式上的提法就是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得到了广大革命阶级、阶层赞同,但却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当权者的阻遏。各革命阶级、阶层合作进行民主协商的联合政府主张虽然不能施行于国民党当权的1945-1946年,但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各革命阶级实行民主协商的政治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着联合政府的精神,向国内的革命团体发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展开了协商建国的政治进程。协商建国的政治逻辑形式上是延续了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内容,将被国民党右派阻遏和打断的民主建国继续下去,但在实际上却是延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政治协商的政治逻辑,而她的理论基础就是新民主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革命的阶级及政党联合起来,建立革命的联合政府,对革命的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逻辑。正是这个政治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即的时候,没有选择像前苏联一样建立单纯的无产阶级专政道路,而选择了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机器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各革命阶级、阶层的领导者,邀请各革命阶级、阶层的政治代表,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各革命阶级、阶层联合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

生的协商建国过程。通过协商建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协商合作的传统,正式凝练成为一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并由此而在国家层面及广大地域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人民民主的协商民主形态,从而实现了民主协商之政治生活的法治化。

中国共产党邀集各革命阶级政治代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建国大业首先体现了十分典型的各革命阶级政治代表之间民主协商的精神。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上的真正民主精神和真诚进行政治协商的态度。各革命阶级及阶层政治代表在参与协商建国上的积极参与,也表明了他们进行民主协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在协商建国的过程中,不论是作为协商建国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仅仅作为协商建国参与者的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方面政治代表,都抱着真诚协商的民主精神,并在坚持民主原则之下进行了充分协商,相互信任,紧密团结,开诚布公,在政治上精诚合作,在理论上凝聚共识,既能坦率真诚充分地表达意见,又能在充分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多各地抗日的政治代表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根本与重大问题上都取得了共识,完成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朽伟业。

经过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各方面政治代表人士之间进行的民主协商,凝结成为一种民主的制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不仅在宪法层面上规范了当代中国的政党关系,而且还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规范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行为,更以领导者的规范引领和促进着参政党的合作与协商行为,从而在整体上维护、巩固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政治协商的制度,为各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政治平台。一方面,各参政党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积极肯定各参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及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代表性,积极地帮助和促进各参政党在政治上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执政党与各参政党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协商提供了一种形态稳定的协商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协商是在一个民主协商的制度平台上进行运作,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各参政党之间政治生活的法治化。各个政党都拥有自己的法律地位,从而避免了在法律关系上的频繁变化及为竞争特殊法律地位滋生的政党关系冲突、政党行为失范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法律地位,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法律地位,以法律地位的稳定性避免了政党关系中的信任减损和合作下降。不仅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政治协商的协商民主平台上,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也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其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层法律关系理顺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政治协商的法治化地位及政治核心作用,增强了信任。各政党间的政治合作关系,即执政党和参政党间的政治合作关系,参政党之

间的政治合作关系,也在其中亦明确规定。从各政党在协商民主平台上展开合作的形式来看,主要就是民主协商,不论是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还是在各参政党之间,彼此合作的形式只能是民主协商。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疑是一套民主的制度。这套制度虽然并不能排斥掉选举的因素,即这套制度也存在着投票选举的环节,没有必要的投票选举,其领导机构及必要的内部组织网络就建立不起来,但她当中的投票选举又并不具有竞争性,至少是没有竞选之环节。但在平等主体协商以谋取共识的方面,她却与西方兴起的协商民主极为类似。这也是有些学者将她定性为协商民主的基本依据。不过,她与西方之协商民主仍然有明显的差异。西方协商民主的主体主要是平等的公民,其民主形式属于直接民主,其适用范围是基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协商主体并非基层公民,而是各个政党,其所展开的协商不是一种民间的协商,而是政党间的协商,从而就不是那种直接民主的制度,而仍然隶属于间接民主的范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被称为协商民主,特别是被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乃是因为这个制度的构造及运行与协商民主所要求的构造与运行特点高度吻合。协商民主在构造上具有对主体平等的严格要求,即参与协商民主的主体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既无任何协商主体拥有优越于他的政治地位,也无任何协商主体可以享有优越于他的政治资源,甚至也无任何协商主体可以操控协商民主的议程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就有关事项展开政治协商的时候,各个政党也处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不论是其中作为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其中作为参与者的各个民主党派,都拥有平等的参与协商的权利,并因协商过程中的权利平等而处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不仅要在政治上互相尊重,而且还要共同维护好政治协商中各协商主体的协商权利。

协商民主在运行上充分体现协商的重要性,从而在运行过程中允许各协商主体接受其他参与者之影响和改变初始立场,从而不仅避免了代议制民主下有关参与者为捍卫偏好而拒绝接受影响和绝不改变立场的弊端,而且也避免了因票决所产生的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裂痕甚至是政治对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在运行过程中,既无立场、观点和建议等通过多数票决的强迫接受,也无因此之政治区分乃至是政治对立而出现的故意标新立异的立场固守,各政党在协商过程中持有开放的立场,互相影响,巩固和发展共识,在团结的基础上达成了公共理性的共同选择。

中国从输入民主概念到形成民主理论,从形成民主理论到孕育出民主精神,再到民主精神驱动了人们广泛的民主行为,最后在民主行为的基础上将政治民主的生活予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收获了作为一种民主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态确立、成型及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不仅提供了民主形态非竞争性最初制度雏形,而且突出了以民主协商谋求共同意志的协商民主特征,更在形态上示范性地展示了在非竞争性基础上实现团结民主、共识民主、共赢民主的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

“五一口号”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

(中国民主促进会西北政法大学支部 张书友)

今年春,习近平总书记两度提及“五一口号”,并要求民主党派重温协商建国的历史,不忘初心。七十前,正是“五一口号”催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1948年5月1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行宪国大”在南京闭幕,选出了总统和副总统,这对每况愈下的战局多少有些“冲喜”的意味,同时也使部分民主人士的“中间道路”幻想彻底落空。同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不难想见,上述一冰一炭、一倔一恭的两种态度将对民主党派的选择发生怎样的影响。5月2日,在港民主人士一致表示拥护“五一口号”,并于5月24日以民主促进会的名义正式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指出:“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亡,中间没有任何第三条路径可循的。”由此可见,“五一口号”及此后的《宣言》是民主党派公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起点,协商建国的序幕由此拉开,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肇造于此。

毋庸讳言,民主党派并非一开始就自觉接受中共领导并甘愿参政党和“友党”地位。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经济地位有所增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议人是颇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施展一番拳脚的。民盟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就把抗战胜利当作“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何以从手边溜走了呢?问题其实不难回答。七十多年前,民主党派成员接受的是一套源自西方的政治理想和政党理论,当他们为中国勾勒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美好蓝图”时,不由自主地将国民党、共产党乃至自身都想象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把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生死搏斗想象成了资产阶级议会中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想象代替不了现实,中国的土壤开不出资产阶级政党的花朵。辛亥革命推翻了宣统皇帝却换来了洪宪皇帝,北伐战争打倒了军阀却造就了更多新军阀。当国民党还是一个革命政党时,也正是通过“党军”的武力扫除竞争者从而建立起了国民政府。1945年,

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两头硬”讲得是国共两党都有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武装力量,正如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诙谐地写道,“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显然,民主党派想与国共两党分庭抗礼、三足鼎立乃至轮流坐庄,不仅国民党反动派和蒋系新军阀不答应,对于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言,无疑也是缘木求鱼。

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民主党派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迷梦中醒来,转向拥护中共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不完全是厌倦了国民党的私人自用和感动于共产党的肝胆相照,更是出于对自身力量、使命与局限性的深刻认识与反省。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主席就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写道:“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灭了。”然而,民主人士抛弃“第三条道路”并非一蹴而就,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也经历了从草创到成熟的探索历程。到1948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失败已是定局问题了,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站到同中共携手奋斗的坚定立场上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以及随后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宣言》,标志上述转变与探索的基本完成,既有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也不同于苏联政党制度的新型政党制度已在这个东方古国破土欲出了。

七十年来沧海桑田,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最正确的选择。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我们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不能变,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态度不能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探索与实践的伟大历史成就,也是上述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五一口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红色基因

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当时形势的重大判断和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其中第四条和第五条对于新中国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缔造与建设至为关键。第四条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第五条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庄严奠基,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活水源头,注入了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不是天生的,而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自觉理性选择。长期稳定全面发展的合作关系和格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精髓和特色,这个精髓和特色是在“五一口号”中统一战线和合作协商理念及其践履的基础上铸就的。以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为主要渠道的政治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有形式,如今已经成为实现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五一口号”倡导的政治协商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壤中结出的硕果。

奋力发挥中国特色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独特优势

肇始于“五一口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既是一种崭新的政党关系和执政方式,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和政治制度。七十年来,中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被不断赋予了丰富而独特的时代内涵,理论特色和实践特色日益鲜明,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独

特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这种独特优势体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方针上,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民主党派的进步性有机统一的合作基础上,体现在“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合作模式上,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的合作关系上,体现在团结、民主、协商、和谐、体谅、包容的合作精神上,体现在“就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协商”的协商原则上,体现在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基层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多渠道多层次的协商途径上,体现在实现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重要政治功能上,体现在既现实又发展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又维护和坚持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机制上,体现在既合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潮流又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的时代特色上。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固守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还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合群睦邻等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要求,我们应该坚守“五一口号”合作协商之初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着力加强合作协商的制度机制和能力建设,推动协商民主多层次、制度化发展,真诚合作,务实协商,同心同向同行,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奋力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效能和独特优势,奏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精彩乐章。

重温合作初心 发挥协商优势

(无党派人士 何小勇)